



大公報記者朱啟平80年前見證日本投降 寫下抗戰名篇《落日》

舊恥已湔雪 中國已新生

歲月長河奔騰不息，但歷史記憶永不褪色。

「日本投降矣！」1945年8月15日《大公報》版面五個超大號鉛字力透紙背。同年9月2日，大公報記者朱啟平、黎秀石在東京灣的「密蘇里」號軍艦上，見證日本代表簽字投降。勝利的消息傳來，中華大地沸騰了，中國人民沉浸在無比喜悅之中。

80年後的今天，大公報記者訪問朱啟平、黎秀石的後人，回溯兩位新聞前輩現場目睹日本代表簽字投降的歷史瞬間，重溫抗戰勝利日到來的榮耀時刻。

正如朱啟平在《落日》結尾所寫：「舊恥已湔雪，中國應新生。」眺望前方，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偉業已經展開壯美畫卷並呈現出無比光明的前景。



掃碼看
《落日》全文

大公報記者 王莉、黃寶儀



1945年9月2日，在東京灣「密蘇里」號戰艦上，朱啟平（箭嘴示）與黎秀石見面。

9月1日午後，烈日把佛山禪城的馬路照得發白，大公報記者循着地址走進小區，帶着歲月痕跡的鐵門哎呀推開，書香混着檀香迎面撲來。藤椅上，九旬的黎秀煊老人抬眼一笑，像等了記者80年。案頭攤開的是他堂哥黎秀石所著的《見證日本投降》一書。

一片烏雲相助 留下中國受降瞬間

「那天上午，我五伯父的位置正對太陽，他很擔心拍不到照片。下一瞬間，一片烏雲飄來，替他擋了光，他趕緊按下快門。就這兩張，留下了中國代表在「密蘇里」號上簽字受降的瞬間。」黎秀煊翻開書籍，其子黎其森在他的指引下將當年的現場細節娓娓道來。說到這裏，兩人又忽然停住，像聽見了1945年9月2日九點十八分的鐘聲。

「父親晚年常說，九點十八分的鐘聲在「密蘇里」號上又響了一次。」電話那端，跨越十二個時區，朱啟平之子朱開宇的聲音從大洋彼岸傳來。隨着朱開宇的回憶，年輕的朱啟平在軍艦上鋪開稿紙，鋼筆沙沙寫下《落日》的情景，恍如眼前。

「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，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『密蘇里』號上，離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，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，向聯合國投降。」1945年9月2日，30歲的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登艦親眼見證日本投降，並寫下了中國新聞史上的知名長篇通訊《落日》。朱開宇回憶：「父親老年時回憶自己的記者生涯，親身參與『密蘇里』艦上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，親眼見證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最後勝利，是他的高光時刻。」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朱啟平隨首批艦隊進入東京灣。1945年9月2日，他登上「密蘇里」號戰艦，親眼見證日本投降儀式。說起這段往事，朱開宇也無比自豪：「當時登艦的共有三名中國記者，父親和黎秀石均來自《大公報》，另一位是中央社的曾恩波，他們都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同窗。父親當晚在橫須賀港中停泊的軍艦上寫下《落日》，民族正義的激情，深厚的國文、記者功底，再加上歷史的際遇，使這篇報道脫穎而出。」

《落日》靈感源自手錶指向「九點十八分」

朱啟平也曾這樣表述《落日》的由來：「想到世界各國有那麼多記者在場，這篇文章一定要寫好，而且要寫出中國人民的風格來。受降儀式結束時，我一看手錶九點十八分，九一八！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。這一靈感使我捕捉住中華民族的感情，寫了《落日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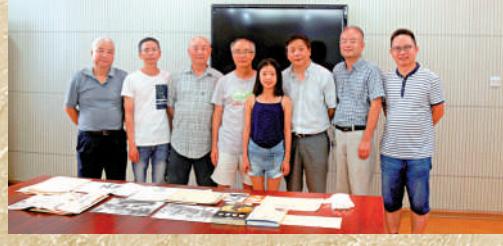
朱開宇動情地告訴記者，由於父親常年奔波在外，雖然一直以來與父親聚少離多，而且總是以「嚴父」的形象出現在子女面前，但在他的印象中，「父親是一位好記者、好父親、好中國人。」他說：「父親一生都堅持，記者要獨立思考、說真話。他是這麼想的，確實也是這麼做的。」

1993年9月，病榻中的朱啟平仍心繫祖國，感嘆道：「我們的國勢猶弱，問題仍多……」1993年11月12日，朱啟平逝世，享年78歲。可以告慰先生的是，如今的中國，已屹立於世界東方，國力昌盛，人民富足，軍威雄壯。GDP總量穩居全球第二，科技強軍步伐鏗鏘，航母列陣、東風凜冽，鑄就捍衛和平的堅強盾牌。中華民族正以自信從容的姿態，邁向偉大復興的新征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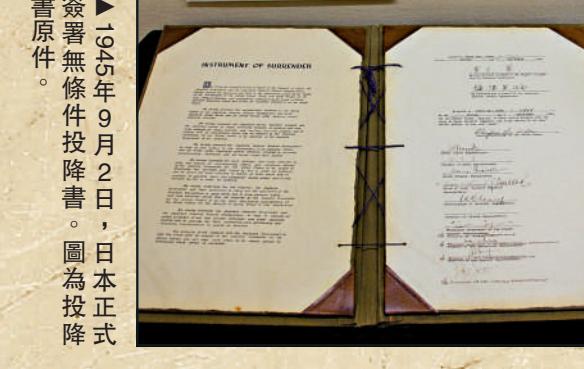
80年彈指，山河已無恙，而鉛字仍在紙上發亮——舊恥已湔雪，中國應新生。

热烈欢迎朱安宇、朱开宇先生来馆访问

2017年，朱啟平之子朱安宇（左四）和朱開宇（左三）向浙江海鹽縣檔案館捐贈朱啟平相關檔案資料80餘件。



▲ 1945年11月1日，《大公報》刊登朱啟平撰寫的長篇通訊《落日》。



▲ 1945年9月2日，日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。圖為投降書原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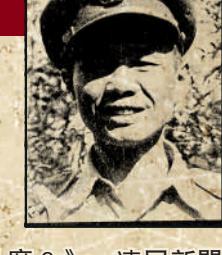
朱啟平



原名朱祥麟，祖籍浙江海鹽，1915年11月生於上海，1940年秋加入重慶《大公報》，於1993年病逝美國家中。1945年9月2日，朱啟平親身採訪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，發回的長篇通訊《落日》傳誦一時，被公認為是「狀元之作」，許多記述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都轉載了這篇文章，後來還被收入高中語文教材、大學新聞教材。



黎秀石



1914年1月出生於廣東南海，1935年從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後，便在桂林《大公報》擔任編輯。1945年9月2日，見證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後，黎秀石第一時間採訪了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，請其發表接受日本投降的感受。隨後，他趕寫出這則消息和通訊稿《懲前毖後》、《日本人在想些什麼？》，連同新聞照片一起發回報社。9月4日，《大公報》重慶版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幾篇文章。黎秀石於2007年5月去世。

「如果他看到今天國富民強一定會感到自豪」

1945年9月2日，美軍「密蘇里號」戰列艦停泊在日本東京灣，甲板上，在中國等9個受降國代表注視下，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。儀式上，三位中國記者中有兩位來自《大公報》——朱啟平和黎秀石。他們距簽字桌不過三五丈遠，親身見證了昔日中國趾高氣揚的日本侵略者俯首稱降的重要時刻，稿件在《大公報》刊發後，產生強烈反響。

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，更是最好的教科書。銘記歷史、緬懷先烈、珍愛和平、開創未來。大公報記者通過多方渠道了解，終於在黎秀石家鄉佛山市南海區當地宣傳部門、檔案館等的協助下，獲得黎秀石堂侄子黎其森的聯繫方式。黎其森表示，可以先與他的父親——即黎秀石的堂弟黎秀煊——進行交流，這讓記者感到格外驚喜。9月1日下午，大公報記者來到位於佛山市禪城區的黎秀煊的家中進行採訪。

赴緬見證反攻 伯父義不容辭

一踏入家門，記者便見到老人面前的桌上擺放着《見證日本投降》等多部黎秀石著作。「堂哥黎秀石比我年長19歲，他見證採訪日本投降儀式時，我還在讀小學。」退休前的黎秀煊長期從事方志編撰工作，多次帶領佛山南海當地縣志辦公室等機構工作人員，前往廣州中山大學的黎秀石家中拜訪，聆聽黎秀石回憶見證日本投降等抗戰經歷故事。「我們都是從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走來，目睹了新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。若堂哥

能親眼看見今日中國之輝煌成就，想必也會深感欣慰。」

今年60歲的黎其森，在其記憶中第一次與五伯父黎秀石的見面，是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。隨着年齡漸長，黎其森陪着父親黎秀煊前往探望黎秀石的次數也越來越多。每次見面，黎秀石都會提起當年見證日本投降的歷史時刻。當年黎秀石被分配到的拍攝位置很不錯，正對着擺在主甲板上的簽字桌子，簽字代表正面對着鏡頭，可完整拍攝到扣人心弦的場面；但當時黎秀石所在的位置又剛好正對太陽，那台陪了他10多年、拍攝過北平被轟炸的小相機沒有擋住直射光的配件。黎秀石焦急之際，天公作美，一片恰好飄來的烏雲擋住太陽直射來的光線，讓黎秀石得以抓住機會拍了兩張中國代表在「密蘇里」號上

簽字受降的照片。「五伯父不止一次提起年輕時「像是被趕狗一樣」的逃亡經歷，這讓他對日本侵華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。後來有機會遠赴緬甸見證反攻，對於他來說既是一種不容推辭的責任，更是壓抑已久的愛國情感終於得以迸發的時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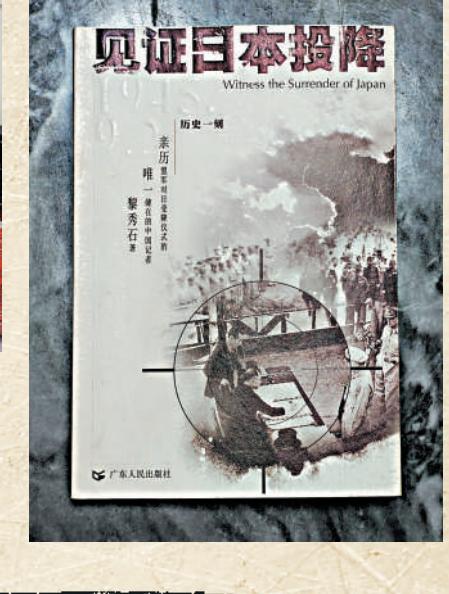
九三閱兵在即，黎其森感嘆道，「如果五伯父有機會看到今年的閱兵式，看到國家從當年的屈辱受難發展到今天的國富民強，一定會會發自內心的自豪。他晚年不斷提及當年作為戰地記者所見證經歷的一切，就是希望告誡後人自強不息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民族悲劇才不會再次重演，國家才能不斷發展、繁榮昌盛。」

大公報記者黃寶儀



▲ 黎秀石堂弟黎秀煊（左）及其兒子黎其森（右）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，回溯黎秀石見證日本簽字投降的歷史瞬間。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

► 黎秀石著作《見證日本投降》。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



► 黎秀石著作《見證日本投降》。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

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什麼選擇9月3日？

1949年底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將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。1951年8月13日，政務院發布通告，將抗戰勝利紀念日改定為9月3日。通告指出：「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，曾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。查日本實行投降，係在1945年9月2日。」

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。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9月3日。」

1999年9月18日，國務院對《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》進行修訂，延續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規定。2014年2月27日，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決議，確定每年9月3日為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」。

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陳明顯表示，沒有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8月15日的原因主要有兩個。一，在中國戰場，8月15日及8月16日以後還在打仗，實際沒有停止；二，「終戰詔書」用詔書的形式宣布投降，沒有國際性的法律根據。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，具有國際法效力，9月3日更適合作為紀念日。人民網

